

55662

206

从第七层楼上 展望世界

〔美〕沃·惠·罗斯托著





2 025 1046 1

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

〔美〕沃·惠·罗斯托著

国际关系学院“五七”翻译组译

GDR: 2/12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W. W. Rostow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New York
1964 First Edition

内 部 读 物

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

〔美〕沃·惠·罗斯托著
国际关系学院“五七”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 1/4 印张 110 千字
1973 年 7 月第 1 版 197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46 定价：0.43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Rostow, Walt Whitman, 1916—)是当代美国垄断集团的御用学者和反动政客。五十年代,他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讲授经济史并主持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六十年代,他因深受肯尼迪、约翰逊的赏识,在这两个总统任内,先后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1969年1月,尼克松接替约翰逊的总统职位,罗斯托也就离开白宫,到得克萨斯州大学重任教职。

罗斯托的论著颇多,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和经济史等等方面。本书于1964年出版,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是他在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期间,从他的这个职务角度出发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由于该委员会是设在国务院大厦的第七层楼上,本书因此而得名。除本书外,罗斯托还著有《共产党中国的前途》(1954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1955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1960年)以及臭名昭著的、以《非共产党宣言》为副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初版,1971年修订重版)等等,后两书已先后于1962年、1964年译成中文本,供批判参考。

作者在本书中大肆赞扬资本主义制度,鼓吹殖民主义,宣传帝国主义对别国的“侵入”和经济渗透能够刺激经济繁荣,

导致殖民地向“现代化”“过渡”。在经济侵略的同时，他还竭力主张美帝国主义保持核威慑力量，搞“实力外交”，建立“伙伴关系”以及鼓吹从对抗走向“谈判”等等，为美苏在全球的争霸制造舆论。

这本《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对于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承袭和调整，对于了解“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将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特译出，内部发行，供有关单位参考。

1973年3月

目 录

序言	3
第一部分 我们的全球战略	7
第一章 引言	7
第二章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	24
第三章 实力与外交	38
第四章 观念与行动	49
第二部分 大西洋共同体:世界北部的问题	60
第五章 大西洋共同体:美国的看法	60
第六章 德国在世界政治演变中的作用	72
第三部分 世界北部与南部之间的问题	84
第七章 战略与经济	84
第八章 民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92
第九章 不发达地区的游击战	113
第十章 经济发动的全国化	122
第十一章 如何建立全国性市场	132
第四部分 东西方之间的问题:冷战	145
第十二章 第三个回合	145
第十三章 胜利之路	157

•
•
•

•
•
•

序 言

当我 1961 年 12 月从白宫的幕僚机构转到国务院任职之时，我问过腊斯克先生，如果他的顾问和计划工作人员避开公众的耳目，岂非更为明智。腊斯克先生却建议我们所有人员轮流向公众解释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我更应该专心致志于阐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哪些是我们广泛的目标？它们是怎样同每天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又如何互相关联的？

由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承担这样的责任不无道理，尽管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大部分是具体而讲究实效的。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两个棘手的重大问题上，其目的是配合政府中负责采取行动的同僚们，协助他们拟订一个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可以改善我国地位的实际行动方针。我们打算让每个计划工作人员不仅成为创作者，而且成为各项实际革新工作的参加者。然而，委员会的集体工作议程遍及国家安全问题的全部领域——从核时代政治方面的问题到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涉及到世界上每一个地区。这样，在一个高度专业化而又部门很多的政府机构中，政策计划委员会就成为可以提出一套全面看法的较少几个场所之一；而这正是我们试图要做的事。

本书反映了我们为执行腊斯克先生指示所做的努力。书

中各章内容最初大抵以讲话的形式出现，对象是美国各地和英国、比利时、柏林、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地的团体。第四部分第十二章本来是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第三部分第九章取材于我在白宫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时所发表的唯一实质性的公开声明——这是我在布雷格堡，主要由外国军事学生组成的一个班举行毕业式上的演讲辞，中心内容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人的颠覆与游击战的手段这类问题。

本书结构沿用了我们在广泛地思考我国各项问题时惯常的思路。第一部分大体勾划了我国战略的轮廓，阐述了我们在实力与外交的关系上所持的基本观点。第二部分谈到美国同自由世界中较先进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做出的努力，以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的伙伴关系，来代替战后旋即形成的严重依赖美国的那种相互关系。从广义上说，这些都是世界北部的问题。第三部分谈到世界北部和南部的关系，也就是对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政策问题。这些国家的社会正处于吸收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早期阶段，它们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就使它们格外易受共产党人渗透、颠覆和叛乱等策略的侵袭。第四部分归结到冷战，也就是东西方关系上面。

上述顺序安排强调一个重要事实：我们固然要对付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即共产党侵略以及东西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但在同时，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我们的主要目的却是积极而带有建设性的。事实上，只有这样一种姿态才使我们有希望在冷战中太太平平地取胜。

书中的这些观点是我们对世界舞台上一个为期三年的急剧变化而表达的。从 1961 年最初几个月里共产党人那种满怀信心、咄咄逼人、迅猛推进的攻势，转变到 1963 年冬共产党世界仍具有危险性但已基本上居于守势的紊乱状态，现代史上还难得见到比这更为戏剧性的变化。在这整个时期，美国的目标、政策和广泛的行动方针始终是稳定的；但第一部分引言却想从政府内部对事态发展的前因后果提出一种看法。

无庸赘言，本书的编写在颇大程度上归功于政策计划委员会中我的同僚们的工作和洞察力，当然也要归功于我有幸与之共事的许多其他军方和文职人员。但是，按照我们在计划工作中力求树立的个人负责制的传统，这些仍可视为我个人为了说明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策所作的努力。而我国政策是由肯尼迪总统所制定，由约翰逊总统重申和发挥，并由腊斯克国务卿在国务院范围内执行的。

我要特别感谢欧内斯特·林德利，他作为国务卿特别助理兼政策计划委员会成员，在极端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对本书原稿进行了编排工作。

沃·惠·罗斯托

1964 年 2 月于华盛顿

第一部分 我们的全球战略

第一章 引言

本书以下各章详细阐明两个宏伟的主题，这两个主题是由于有关的时代背景和我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产生的。

第一个主题是扭转共产党人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发动巨大攻势这一短期性问题。共产党攻势在 1953 至 1958 年间已初具规模，1957 年 10 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急剧地加快了步伐，1961 年 1 月时仍以明显的势头向前推进，直到大约 1961 年 5 月至 1962 年 10 月才真正被迫停止下来。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 1962 年《公告汇编》前言中写道：

“未来的历史家回顾 1962 年，完全有理由把这一年当作国际政治浪潮终于开始朝着多样化的自由世界滚滚奔流的标志。随着 1957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苏联开始对非共产主义世界加强压力——特别是在东南亚、在非洲中部、在拉丁美洲以及在柏林周围。苏联空间活动的烜赫成就被用来证明，共产主义掌握了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锁钥。许多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归宿这一概念。

“1962 年中止了这一发展过程。”

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显然是这个伟大转折中的一个历

史标记。但肯尼迪总统早在 1962 年 3 月 23 日，即他就职后十四个月，就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次演说中，反映出潮流已在改变方向的见解。

“几年前，经常有许许多多关于共产主义注定会胜利的谈论。现在我们很少听到这种论调了。凡是考察当代世界的人，谁也不会怀疑历史的洪流正在把我们的世界日益冲离一元化的观念，趋近多元化的观念——冲离共产主义，趋近民族独立与自由。谁也不会怀疑，未来的潮流并不是听任一种单一的教条式信仰来征服世界，而是把自由国家和自由人民多种多样的活动能力解放出来。”

接着他谈到了第二个主题：

“因此，在司空见惯的连珠炮般的危机之外，正在涌现出一个健壮的、生气勃勃的世界大家庭的轮廓。它建立在确保自身独立的各个国家的基础上，又由于共同献身于世界和平而团结在一起。如果说这样的世界明天或后天就会赢得，那就未免愚蠢。历史的进程变幻无常、捉摸不定、令人苦恼。前途还会遇到阻挠和挫折。将来还会出现忧虑与悲哀的时刻。热核战争的魔影仍将笼罩人间……

“然而，我们今天对历史前进的方向能够产生新的信心……

“……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一自由与多样化世界的远景——并相应地规划我们的政策，以加速走向一个更为舒展自如的世界秩序的进程。

“正是这种精神在今天的世界上把我们的各项政策统一起来。”

本书第二个主题包罗了建立“一个健壮的、生气勃勃的世界大家庭”的各个具体方面，即：我们同欧洲和日本的伙伴关系问题；自由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较先进国家建立新的、建设性的关系问题；当机会到来时争取同共产党国家达成协议，使大家的安全增添一层保证的问题；以及运用适当规模和类型的军事力量来支撑整个艰难险阻的历史进程，从而不仅保护我们自己，而且有希望造成一种尽可能稳定的军事环境的问题。

二

一场紧张的、殊死的短期性斗争同我们在许多战线上建设工作的较长节奏相配合，明显地构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但这个业绩又有别于我们过去称之为“伟大”的那些业绩。

在本世纪里，我们一般想到的“伟大”时期，有着两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在实施国内政策的过程中有时候突然涌现出一系列对我们的社会组织有长远影响的重大新立法。1900年以来有过两次这样的时期：威尔逊总统第一任时期以其“新自由”概念为基础的立法实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第一任期间源源不绝的关于“新政”的立法。

我认为也可以把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列入伟大时期之内。虽然在他执政期间真正通过的新法案为数有限；但他却为我国对内对外的新态度和新政策奠定了基础，这对以后许多带根本性的情况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二十世纪称得起伟大的第二类情况是在国际舞台上出现

极其险恶的危机关头。西奥多·罗斯福曾竭力教育全国人民，要他们看到未来的世界权力并准备承担责任。他的努力没有充分奏效。美国在 1917 年不得不参战，以防止西欧和大西洋的权力落到敌视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势力手中。这样我们就一笔勾销了早先所奉行的孤立主义。1941 年，由于通过了租借法案并在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全部卷入战争，我们为了拯救美国的切身利益，又不得不置身于一场世界冲突之中，从而再一次勾销了在这以前全国奉行的孤立主义。1947 年，我们为了拯救与保护西欧和维持世界力量均势，不得不扭转战后随即奉行的政策的方向。1950 年 6 月，我们不得不在朝鲜作战，以对付一次重大的共产党侵略行动，并弥补我们在远东常规军事力量编制上的弱点——这一回又是由我们战后的军事预算相对地降低所造成的。

由此可见，本世纪以来我国行政领导的伟大时期，不外是在国内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以纠正我们先前政策上的偏差，或对外应付生死攸关的危机的那些时期。

三

肯尼迪政府上台时，我国对内对外确实都需要采取新的、重大的主动行动，但当时无论在內政或外交方面，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达到压倒一切的危机阶段。由于没有重大危机的刺激，没有重大危机在我们坚强的全国大家庭中产生的那种一致意见，美国领导人对内和对外的任务只能是在相当多的时期内，通过积少成多的方式，引导我们朝着远大的目标前进。

在国内问题上，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只是经过持之

以恒的行政领导,加上持续不断的倡议和辩论,才能在有关种族关系、工资、物价、企业扩充、教育以及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等方面,推动我国政策朝着他们所寻求的方向发展。

在国外,肯尼迪总统 1961 年 1 月面对着一系列危险的、日趋恶化的危机,同时也面临着改变政策方向的需要,即改变我们对西欧与日本,对拉丁美洲,对非洲、中东、亚洲等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以及关于我们的军事能力和在可能的情况下关于控制军备竞赛的政策。肯尼迪总统的目标就在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不通过战争来改善自由世界在冷战中的地位。而由于自由世界内部这些建设性问题的固有性质,当时形势所许可和所要求的只能是在连续的很多时期内,把事物慢慢地、不规则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推进。

四

然而,当务之急首先是冷战本身的问题。1957 年,即斯大林死后四年,赫鲁晓夫终于巩固了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控制,成为莫斯科掌管一切事务的、无可争议的主宰者。随着 1957 年 10 月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他也全速发动了战后年代第二次巨大的共产党攻势——第一次攻势是斯大林发动的攻势,在西方,由于 1949 年柏林空运的成功^①,在东方,由

^① 根据克里米亚声明和波茨坦协定,战后德国由四国分区占领。凡涉及全德性事项,则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共同处理,并采取适当的一致行动。管制委员会总部设在柏林,故柏林亦由四国分区管制。但自 1946 年以来,美英法三国即违反协定精神,活动分裂德国。1948 年 6 月,美英法在西占区内发行“B”字马克,实行单方面币改,并将该种马克流通到柏林苏占区。苏军管当局被迫采取措施,限制柏林与西占区通道和贸易往来。美英等国即威胁要“武力解决”,并派飞机飞越当时在苏军管制下的东德西部上空,向柏林进行空运。——译者

于中国共产党军队 1951 年 4—5 月在三八线附近的失利^①，这一攻势遭到了失败。

赫鲁晓夫力图利用苏联核力量及其以中程弹道导弹摧毁西欧的能力所显示的形象，对西方国家施行讹诈，迫使它们拱手让出西柏林。

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地区，莫斯科力图通过以下方式扩张势力：即运用游击战、颠覆、贸易、援助等各种各样手段；挑动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突出共产主义的形象，把它标榜为使不发达地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方法，标榜为正在迅速地、从四面八方围住那懒洋洋地跑在前面的美国人的一种制度。

到了 1961 年 1 月，1958 年的柏林通牒旧帐未销，又对西方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从万象到雅加达，东南亚的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共产党人对刚果的威胁还没有得到控制，卡斯特罗又对整个拉丁美洲施展蛊惑人心的危险的伎俩。自由的事业看起来处处居于守势。

1961 年 1 月以来冷战中力量对比的变化，其富于戏剧性堪与我们在当代所见到的任何变迁相比拟。但这个变化不是由一场战争或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或危机所引起的，它是一系列军事和政治行动的产物。每个行动都是艰难而持久的，每个行动都包含着希图侥幸取胜的冒险的时刻，当然，这在 1962 年 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才达到了高潮。因此，潮流慢慢转

^① 事实是，1951 年 4 月—5 月，中朝人民部队进行了第五次战役，在三十天的两次大反击中，总计毙、伤、俘敌 46,302 名，其中美国侵略军为 10,873 名，迫使美李部队在整个战线上败退 50—70 公里，逃回到三八线以南。为了进一步歼灭美李军有生力量，我于歼敌之后，主动转进到三八线以北的有利地区。——译者